

城址是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的核心要素之一。20 世纪，全国各地陆续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城址群，但作为仰韶文化发源地及核心区的陕西地区始终未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址。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间，内蒙古中南部陆续发现三个新石器时代石城聚落遗址分布区，城址体量小，数量不大。约略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发掘了清涧李家崖商代石城，但陕北一直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夯土城址或石城遗址。

2000 年至 2010 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环境、生业与文化研究”专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在无定河流域——大理河流域和榆林各县陆续发现 30 余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城。当时，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拟开展榆林地区史前石城专题调查，但由于缺乏资金而搁浅。

2012 年后，随着石峁遗址的发掘和学术界对陕北史前石城的高度关注，史前石城考古调查被逐步提上日程。2019 年，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向榆林市政府申请专项经费，开展了“榆林地区史前至商代石城遗址专项考古调查”工作，以期摸清榆林境内史前石城的家底，促进学术研究，为史前石城保护提供依据，并助力石峁遗址“申遗”。本次田野考古调查始于 2019 年 10 月，结束于 2025 年 8 月，历时近 6 年。

### 工作方法

榆林面积广袤，地形复杂，野外交通不便，冬季积雪阻滞，加之本次调查人员较少，经费有限，工期紧，不可能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多年田野考古经验表明，榆林史前及商代石城主要分布于河流交汇的夹角处。我们请自然资源部第二地形测量队制作榆林水系图，结合奥维地图，对河流交汇地点的山崩开展考古调查。另外，每条河流上游区域黄土之下的基岩很少暴露，缺乏构筑石城的石材，所以这类区域基本不存在石城遗址。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河流上游区域排除在调查工作之外，调查工作主要集中在各层级河流中下游。我们充分利用既往考古资料，并在每个村庄打听石城分布信息，最大限度加快了调查进度。

我们采取“分步走”的工作策略。第一步，尽快发现石城，“不纠缠”。2019 年至 2023 年，各组队员依照既有水系分布图，对基岩暴露区域的河流交汇点逐一踏查，尽快找到史前石城，完成标本采集和基础信息记录，形成“榆林史前石城分布总图”。第二步，补充采集信息，“回头看”。2024 年至 2025 年，对已发现的所有史前石城开展航拍测绘和其他信息采集，新发现了一批被遗漏的石城。第三步，资料整理与报告编著。在野外调查期间，2023 年开始资料整理、样品检测和考古报告编著，计划 2026 年底完成 10 本考古调查报告的编著工作。

### 调查收获

**石城数量与层级** 本次榆林地区考古调查共发现 573 座史前至商代石城聚落遗址。其中，榆阳区 30 座、佳县 64 座、神木市 89 座、府谷县 41 座、米脂县 39 座、横山区 63 座、绥德县 78 座、清涧县 73 座、子洲县 69 座、吴堡县 26 座、靖边县 1 座。目前，邻近的内蒙古中南部、晋西北各发现史前石城约 20 座，陕西延安发现 3 座，冀西北的张家口地区只发现邓槽沟梁 1 座。

可见，在陕、晋、蒙、冀四个省区中，榆林地区是中国史前石城分布的核心区，而且各阶段石城群落中，体量最大、规格最高的石城也位于榆林。榆林史前石城按照面积可划分为 5 个层级。第一层级城址面积为 400 万平方米以上，只有神木石峁遗址属于这一层级，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第二层级城址面积为 100 万～150 万平方米，如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佳县乔家寨、龙山晚期的府谷寨山、善家峁等，目前共发现 9 座。第三层级城址面积为 50 万～100 万平方米，数量约 29 座。第四、五层级城址的面积均小于 50 万平方米，数量约 534 座，其中最小的城址面积仅 2 万平方米。

**城址年代与文化属性** 榆林地区石城聚落的年代始于仰韶晚期，终于商周之际，即公元前 28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大约延续了 1800 年，可以划分为四个大阶段，目前初步确认了每个时期的文化属性。

**仰韶晚期** 榆林史前石城聚落的兴建年代最早可至仰韶晚期后段，测年数据约为公元前 2800 年至公元前 2700 年，文化内涵与仰韶文化庙二期类型比较相近，包括临近的阿善二期和海生不浪类型，都应该看作仰韶文化在北部边缘的区域类型，同时受到甘青宁、燕辽、华北、中原、海岱地区的文化



榆 1 号城顶部石堆



仰韶晚期陶器

## 发现

影响。这一时期石城数量极少。

**龙山早期** 测年数据约为公元前 2700 年至前 2300 年，以佳县乔家寨、横山金山寨、瓦窑渠等遗址为代表。在龙山时代最初阶段，具有标识意义的器类是乔家寨遗址发现的数件最早形态的陶甗裆部和尚未消失的尖底瓶等器类组合，表明榆林与陕晋豫地区同时进入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只是榆林地区的陶甗仅存在于最高等级聚落中，并与玉礼器、白陶、彩陶、礼制建筑等礼制要素共存，基本不出现于中下层级聚落中，因此比较罕见。此外，陕北及河套地区的尖底瓶沿用至整个龙山早期，比陕晋豫地区尖底瓶沿用时间长 500 年左右，与陕晋豫地区出现了一定的文化分野，加上石城的大规模出现，标志着以榆林为代表的河套地区不再是陕晋豫地区的文化边缘区和附属区，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亚区。这一时期是榆林史前城址数量最多的阶段。

**龙山晚期** 测年数据约为公元前 2300 年至前 1800 年，下限可至公元前 1750 年前后，其后半程已进入夏纪年阶段，文化属性分属石峁文化、杏花四期文化和老虎山文化等。石峁文化是其中最强势的文化类型，后期完成了对河套地区的文化整合，并受到客省庄文化、齐家文化、陶寺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一时期城址数量比前一阶段略有下降，但出现了最大的都邑级城址——石峁。

**二里头晚期及商代** 很多史前石城被朱开沟文化和李家崖文化分别占据，甚至沿用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榆林及河套地区出现周文化的墓地 and 典型器类，石城被普遍废弃。

**石城空间分布规律与历时性变迁** 榆林史前石城沿河流两岸分布，往往多座城址聚集为一组，周边分布着大量无石城墙的普通聚落，显示出明显的社群关系。

石城的分布空间发生过转移。仰韶晚期到龙山早期，石城的主要分布区域位于榆林南部，而榆林北部的神木、府谷早期石城相对稀少。到龙山晚期，榆林南部的早期石城大多被废弃或急剧衰落，而榆林东北部的神木、府谷、榆阳、佳县北部等地成为新一批石城主要营建区，形成了以神木石峁遗址为核心的史前石城分布格局。张家口邓槽沟梁石城应该是在榆林龙山晚期石城扩张背景下形成的。榆林商代石城多是对史前石城的沿用，其空间格局可以分为两个区域，李家崖文化占据着黄河两岸，朱开沟文化占据着偏西北的区域。

**石城的形制差异** 榆林史前石城聚落轮廓有单城圈、“并联式”多城圈、“串联式”多城圈和“套合式”多城圈等多种空间布局类型，且城壕圈外还分布着无防卫设施的居住区和墓地等功能区。这些石城由早到晚经历了聚落规模由小型到大型、空间布局由简单到复杂、构筑技术由原始到成熟的变化历程，且层级分化特征逐步强化。

### 石城源流

关于陕晋蒙三省区史前石城址的渊源众说纷纭。我们认为，这些史前石城是在燕辽地区文化西进的强烈影响下出现融合产生的。

从仰韶时代早期后段开始，陕晋蒙交汇的河套地区就已经是仰韶文化即史家类型和东庄类型移民占据的区域。经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到仰韶文化晚期前段，这里都是仰韶文化的北部疆域。在长达约 1500 年的漫长时段内，河套地区仰韶文化并未演化出使用石材构建房屋、墙体、墓葬的传统。而以石材构筑积石设施的燕辽地区，自兴隆洼、赵宝沟到红山文化，都流行积石设施。特别是红山文化坛冢遗存，其积石设施已达巅峰。河套附近除红山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均未见到大规模原生型的积石遗存和文化传统，而恰恰在仰韶晚期出现了红山文化及其积石家大规模西进的现象。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河套地区史前石城址是在红山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

从宏观的时空视角看来，榆林及河套地区所在的黄土高原与燕辽地区的早期文化互动历程，大概可分为三大周期，石城的出现和传播出现在第二、三周期。

第一周期，仰韶文化史家期至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向四面扩张外溢，引起周边多个区系的文化突变，燕辽地区红山文化彩陶的突然流行主要是仰韶文化影响的结果。

第二周期，则是仰韶晚期到龙山早期，随着仰韶文化的衰解体，周边文化纷纷崛起并影响仰韶文化原有区域。红山文化的核心要素应该是在这样的发现背景下，经张家口地区对黄土高原北部产生了深度影响。河北张家口地区最新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遗址群，数量巨大，表明红山文化大概距今 5200 年至 4800 年向西迁徙或扩张，并对河套陕北、晋北及内蒙古中南部的文化产生强烈影响。随着红山文化石材构筑物传统一起传入河套地区的，还有石板墓以及红山文化风格的绘画、玉礼器、石雕像等早期礼制要素。与红山文化不同的是，以榆林为重心的河套石城分布区的文化底色依然属于本土文化，石材构筑物是石城聚落，而不是红山文化那样远离聚落的庙坛冢等纯粹的宗教礼制设施。

第三周期，大约距今 4100 年至 3800 年之间，黄土高原以陶甗、甗、绳纹夹砂罐为代表的石峁文化向东扩张至冀西北及燕辽地区，导致张家口邓槽沟梁石城及典型石峁文化陶甗的出现。此后，陶甗、陶甗、夹砂绳纹罐等源自黄土高原的典型文化要素和石城出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应该与河套地区这次文化东进浪潮的余波相关。

### 学术意义

本次调查发现了 573 座史前至商代石城遗址，为全面了解中国北方地带史前城址的起源、发展、传播、演变提供了全新的信息。以榆林为重心的河套地区，在仰韶文化早中期是各区系文化的边缘或附属地带，文化和社会进程长期落后于各文化中心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聚落骤增，石城群落突现，聚落层级分化显著、礼制要素高度聚合，已进入早期礼制社会，表明这里已经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和文明高地。这种文化地位突变和社会进程突进，与燕辽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乃至南方地区对黄土高原的文化影响密切相关，是观察黄土高原文化地位兴衰周期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探索中原夏商文明的重要源头。此外，本次调查将为石峁遗址“申遗”和史前石城的保护利用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执笔：马明志 康宁武 周健 李俊 常经宇）

## 山西沁水八里坪遗址 2025 年考古发掘收获

八里坪遗址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郑庄镇八里村与庙坡村之间，遗址面积不小于 100 万平方米，是山西高原东南部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包含庙底沟二期、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三个阶段的遗存。经过五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确定了遗址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距今 4300 年左右）即规划了内中外三重环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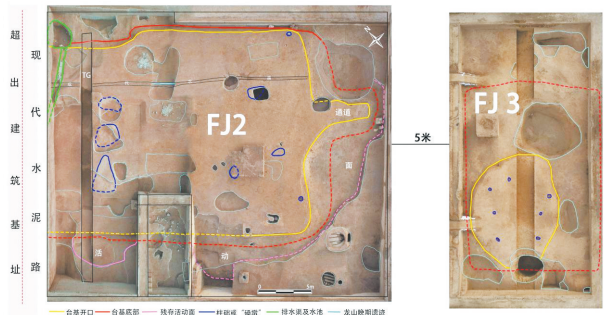
八里坪遗址 2025 年的发掘工作，沿着 2023 年至 2024 年发掘的建筑基址（FJ2）东部布设探方，主要目的是确定新发现建筑基址（FJ3）的年代、结构以及与 FJ2 的关系。

FJ3 位于 FJ2 东部 6 米处，南北向，台基表面被龙山时期文化层叠压或被龙山晚期灰坑打破。残存部分形状不规则，南北长 11.25、东西宽 8.2 米，清理发现 8 个柱洞（因解剖示意图上留有 7 个）。FJ3 基础部分南北长 20.2 米。经过解剖发现，FJ3 营建方式与 FJ2 基本相同：先挖基槽，后用纯净的红褐色、黄褐色土逐层起夯，共夯筑 11 层，至同一水平面后开挖柱洞，最后铺垫红褐色土。根据已有发现推测，FJ3 是 FJ2 同时期的附属建筑，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同时规划营建。与 FJ2 被龙山晚期规划的制陶作坊区打破情况相似，FJ3 也被龙山晚期陶窑打破，显示两组建筑废弃时间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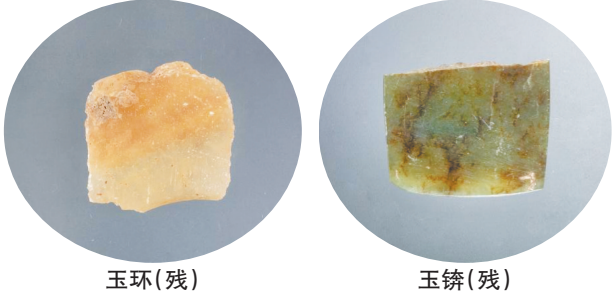
发掘和解剖过程中在 FJ3 废弃堆积内出土玉环（残）、玉锥形器、玉铸（残）、人面形簪手等高等级遗物。与 2023 年至 2024 年发掘 FJ2 废弃堆积时出土玉环、白陶鬲足、板瓦残块的情形如出一辙，再次验证了这组建筑的等级应为官殿式建筑。

2025 年的发掘工作，进一步验证了八里坪遗址中壕沟内围合的区域是整个聚落的核心建筑区，其功能类似陶寺的宫城。中壕沟内存在不止一处大型建筑，而是功能上有联系的一组建筑群。

本年度的发掘工作也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首先，验证 FJ2 的西部是否有与 FJ3 年代相同的附属



2025 年发掘的 FJ3 与 2023 年至 2024 年发掘的 FJ2 的相对位置关系示意图



玉环（残）

玉铸（残）

建筑；其次，确定 FJ2–FJ3 南部是否有其他同时期的附属建筑或设施。由于建筑基址保存较差，中壕沟内大部分区域耕土层下即是早期遗迹，遗迹本身又被龙山晚期的遗迹打破，普通的钻探效率低、效果不理想。因此，需要继续以探沟或探方发掘的形式解决建筑的布局和年代等关键问题。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执笔：赵辉 王鹏欣）

## 江苏常州茭蒲巷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

茭蒲巷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茭蒲巷社区，大运河（南市河）与古城中轴的交汇处。为配合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由于地块内大部分区域被现代地下室和管线设施破坏，实际发掘面积约 3000 平方米。遗址地处常州古城核心区，周边分布有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南市河历史文化街区、大运河常州城区段、盛宣怀故居等文物遗存。根据文献记载，遗址周边历史上还分布有毗陵驿、烈帝庙、张王庙、真武庙、江东祠、荆溪馆等古迹，是一城繁华之所在。

### 主要遗迹

茭蒲巷遗址地层堆积丰富，整体地势北高南低。共清理各类遗迹 156 处，年代涵盖汉代、六朝、唐代、五代十国、两宋、元明清各个时期，连续不断，传承有序。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六朝时期道路、沟渠，唐、五代时期夯土城墙、城壕、街巷、道路与排水设施，宋代大型建筑基址及院落等遗迹。

唐、五代时期城墙呈西北—东南方向，与大运河（南市河）平行，宽 10～12 米，有内、外两道城壕。内城壕较浅，宽 5～6 米、深 1.8～2 米；外城壕较深，且有复杂的水利设施与大运河相通，宽 10～11 米、深 3.8～4.2 米。城壕被破坏比较严重，仅存墙基，建造方法采用堆筑和夯筑相结合，中心部位以灰黑土逐层堆高，部分区域可见成排の木柱和夯窝，墙芯外侧用纯净的黄土夯打，形成护坡，未见包砖痕迹。在城墙以北的“城内”区域，发现有同时期的“市政”设施，包括砖砌排水沟、道路、建筑基址、灰坑等遗迹。

清理宋代大型建筑基址两处，一处位于发掘区东部，由 7 个方形礅墩组成，平面呈长方形，大部延伸至发掘区外，残长 15.2、宽 4 米，根据其分布位置和形制特点，可能与历史上常州城内的烈帝庙祖庙有关。另一组相对完整，为三进五开间的大型建筑，面向古运河，平面近长方形，中部存在“减柱”现象，东西长约 25、南北宽约 17.5 米，残存 16 个方形礅墩，由碎石和纯净的黄土层层夯筑而成。根据建筑形制和规模，以及出土的大型石构件、器底墨书“西教”“法”等内容的瓷器等，推测与宋代常州城内的驻军教场或法济寺等官式建筑有关。

### 出土文物

茭蒲巷遗址出土春秋至明清时期文物 500 余件（套），包括瓷器、陶器、金属器、漆木器、骨角器和石器等。虽未发现春秋时期文化层或遗迹，但部分灰沟底部出土石铸、印纹硬陶残片等，表明先秦时期已经有人类在此活动。汉、六朝时期遗物包括陶质排水管、钱纹砖、盘口壶等。唐、五代时期遗物主要出土于城壕内，以瓷器为主，窑口众多，包括巩县窑蓝彩碗、长沙窑瓷杯、越窑青瓷罐、秘色瓷盘等，还有大量本地窑漂窑生产的青瓷碗、钵、盏、杯等日用器。陶器数量较多，以各类建筑构件为主，包括大型建筑的瓦作构件、花纹砖以及莲花纹瓦当，表明周边可能存在高等级建筑。此外，城壕内还出土大量动物骨骼、铜钱以及少量漆木器，铜钱以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为主，还有少量唐国通宝。宋代遗物以瓷器为主，窑口众多，可辨有景德镇窑、龙泉窑、吉州窑、建窑等，部分瓷口沿处用银包边。陶器包括各类建筑构件如脊兽、瓦当、滴水等，还发现有大量礅石、建筑倒塌堆积和人骨等，可能与宋末“常州保卫战”有关。明清时期遗物以各类青花瓷器为主，还出土明末紫砂名家陈用卿款的紫砂壶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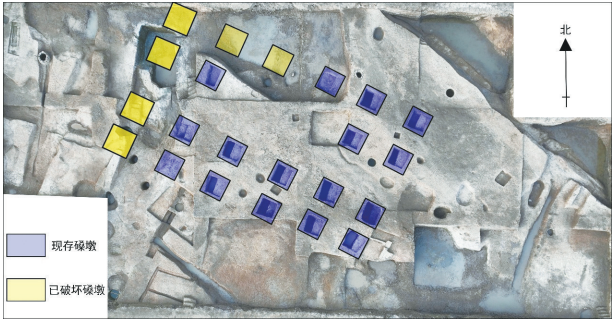
### 发掘收获

茭蒲巷遗址的考古工作系统展现了常州古城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内涵，是城市考古的重要成果，对江南城市发展演变研究以及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遗址紧邻大运河，发现了长达两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化堆积，尤以唐宋时期最为丰富。文献记载常州在晚唐、五代时期大规模筑城，由“内子城”“外子城”“罗城”三道城圈构成，本次考古在外子城和罗城之间新发现一道城墙，并且与大运河走向密切相关，不仅改写了常州古城的发展历史，也为研究古代城防体系与筑城技术提供了新的材料。复杂的水利设施、来自全国各地窑口的瓷器，凸显了大运河对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作为“因河而生、因河而兴”的江南名城，茭蒲巷遗址考古工作充分印证了大运河在常州古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唐、五代时期建筑基址



宋代大型建筑基址



瓷碗底部墨书

五代十国常州先后属杨吴和南唐，地处与吴越国对峙的前线，双方在此反复争夺，作为拱卫都城江都（今扬州）和江宁（今南京）的重要“堡垒”，常州城市规模和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开宝年间，为配合宋灭南唐之战，吴越国出兵攻占常州，之后“纳土归宋”。本次发掘见证了这段历史，为唐宋之际江南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材料。

茭蒲巷遗址两宋时期文化堆积深厚，发现有两座大型建筑基址，出土“绝上”铭文的戳印以及墨书“西教”和“法”的瓷器，可能与古城内毗陵驿、法济寺以及驻军教场等重要建筑有关。据《咸淳毗陵志》载：“荆溪馆旧名毗陵驿，在天禧桥东，枕漕渠以通荆溪。”又“荆溪堂，旧志云：在法济寺前，毗陵驿之东。建炎三年及绍兴七年，高宗皇帝车驾往来金陵，尝一再次荆溪堂”。法济寺旧名浴堂院，原址位于西排湾（今青果巷西侧）。宋代常州城内驻军分为禁军和厢军，禁军为威武六十六指挥、雄节十二指挥，北宋时期城内教场在真武庙前、天禧桥东。通过以上文献资料，结合本次考古发现，基本可以复原茭蒲巷遗址在宋代常州城内所处的地理位置，即真武庙和毗陵驿以东、法济寺以南、运河以北，靠近荆溪馆与北宋时期驻军教场（西教），是当时城内重要的公共空间。

在宋代文化层上普遍存在比较厚的倒塌堆积，砖瓦、陶瓷碎片和人骨混杂，还出土石质、陶质和铁质的礅石，可能与宋末“常州保卫战”有关。南宋末年，面对民族危机，常州以孤城抵抗半年之久，被誉为“纸城铁人”，文天祥过常州时哀叹“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茭蒲巷遗址的考古发现直观展现了当时战争的惨烈，以及先民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保家卫国的悲壮事迹。

茭蒲巷遗址考古成果为常州以及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新的材料，是大运河考古的重要发现，实证常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涵，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可歌可泣的发展历程。

（常州市考古研究所 执笔：黄督军 郑铎）